

编者按 国际关系研究一直被看作是社会科学中世俗且具实证性的研究领域,宗教及向来与国际权力体制没有关系的非国家行为体——各种类型的宗教组织在其中难有一席之地。20世纪下半叶以来,全球宗教复兴、宗教的政治化趋势及国际关系的“宗教回归”,尤其是震惊世界的“9·11”事件,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世俗媒体和学界对国际关系中宗教作用的传统看法,引发和推动了国际关系研究的“宗教转折”甚至“范式转移”,使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成为21世纪以来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学术热点和增长点。那么,如何评价全球宗教复兴对当前国际关系的冲击,国际关系研究的“宗教转折”有何特点?我国宗教与国际关系的研究取得了哪些成绩,还存在哪些问题,今后努力的方向是什么?为此,本刊特约记者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涂怡超专访复旦大学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徐以骅教授。徐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宗教与国际关系、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美国宗教、中国基督教等,著有《宗教与当代国际关系》《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后冷战时期的宗教与美国政治和外交》等。

21世纪以来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

——徐以骅教授访谈

本刊特约记者

一、宗教对当代国际关系的冲击

涂怡超(以下简称“涂”):您如何看“全球宗教复兴”及其对当代国际关系

的冲击？

徐以骅(以下简称“徐”)：目前,学界对所谓“全球宗教复兴”现象有许多说法,其中比较准确的还是研究宗教与国际关系的学者乔纳森·福克斯(Jonathan Fox)的界定,即“全球宗教复兴指宗教日益具有显要性和说服力,如在个人和公共生活中日见重要的宗教信仰、实践和话语,宗教或与宗教有关的人物、非国家团体、政党、社区和组织在国内政治中日益增长的作用,以及这一复兴正以对国际政治具有重大影响的方式发生”。^①从该界定来看,“全球宗教复兴”包含以下三个要素,即全球性的宗教增长、非疆域和跨国性宗教行为体的政治参与或宗教政治化,以及宗教复兴对国际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

学术研究和学科发展通常是对某一运动和现象的滞后反应,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也不例外。宗教研究和国际关系研究均为学术研究的“大户”,但过去两者及与两者有关的分支研究如宗教与美国外交很少交集,被称为“两股道上跑的车”。宗教在威斯特伐利亚国际关系体系中没有地位,宗教研究在当代国际关系研究中自然也没有地位。^②

然而,宣称“放逐宗教”的威斯特伐利亚国际关系体系“拖泥带水”。尽管罗马教廷或罗马天主教被逐下神坛,退出了国际舞台,但因宗教改革运动所确立的“教随国定”原则而在欧洲一些国家取得国教或“国有化”地位。此后,宗教(主要是基督宗教)在欧美地位每况愈下,今不如昔,在世俗化、现代化、城市化和工业化等浪潮的多重夹击下,逐渐淡出公域而退居私域,而17世纪以来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扩张,将主权至上的民族国家体系扩展至世界其余地区。于是,现代化和世俗化并驾齐驱,互为表里,席卷全球。“世界除魅”“上帝已死”“后世俗时代”等在20世纪60年代成为风靡一时的时代标签。

此种“宗教私人化”趋势尤以欧洲为甚,但即使在被视为世俗化“法外之

^① Scott M. Thomas, *The Global Resurgence of Relig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ruggle for the Soul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p. 28-32.

^② 关于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的现状,参见徐以骅:《导论:当代国际关系的“宗教回归”》,载徐以骅等:《宗教与当代国际关系》,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28页;徐以骅:《全球化时代的宗教与国际关系》,《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9期,第4—18页。

地”的美国,基督教在美国的人口比例、社会影响和政治地位也在逐步下降,对其地位的描述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圣经共和国”、19世纪20年代的“第二次宗教非确立”、60年代的“三大宗教模式”(即基督教、天主教、犹太教三元熔炉,或犹太—基督教传统),一直到现在的“后基督教时代”,其所谓“瓦斯普”(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WASP)传统文化根基发生了根本性的动摇。当然,断言基督教在美国已日薄西山,成强弩之末,仍为时过早。近30多年来,美国基督教福音派和宗教右翼的大规模崛起和“政治觉醒”,就是对上述趋势的强势反弹。

上述宗教“国际化—国有化—私人化”发展趋势,主要还是适用于欧美,在许多非西方国家和宗教传统中,甚至在一些西方国家里,现代化并未导致宗教的边缘化和私人化。正如南非圣公会黑人荣休大主教图图(Desmond Tutu)所说,世俗主义如此充斥西方,令西方传媒和社会科学对非洲和其他发展中地区所习以为常的宗教视而不见。已故美国宗教社会学家贝格尔(Peter Berger)曾称,当代不可理喻的不是信守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伊朗的毛拉,而是死抱世俗化教条不放的美国大学教授。^①由此可见,忽视宗教的倾向主要还是“西方现象”,植根于社会科学的“西方中心主义”,而国际关系学在许多方面又是社会科学领域最以西方为中心的学科,因此,国际关系学可说是“宗教无用论”的重灾区。

打破上述忽视宗教的“西方现象”的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性的宗教复兴运动及宗教对国际关系中心舞台的“回归”。此次全球性宗教复兴尽管是不分地域和宗教的,但主要发生于亚伯拉罕诸教的“三大跨国宗教运动”即伊斯兰教、基督教福音派和罗马天主教,而且主要发生于发展中国家。20世纪下半叶的全球宗教复兴源深流长,但如要确定一个标志性年份的话,那就非1979年莫属,该年发生的伊朗伊斯兰革命、阿富汗圣战运动、麦加大清真寺被占、波兰籍教宗首次回祖国访问、美国宗教(或基督教)新右翼崛起等一系列由宗教驱动和引发的重大事件,对20世纪后期以来的国际宗教乃至政治格局产生了

^① 转引自徐以骅:《当前国际关系的“宗教回归”(代序)》,载徐以骅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第四辑上),北京:时事出版社2007年版,第15—16页。

深远影响,也对世界各大国和各地区在宗教领域的治理能力形成重大考验。^①

涂:如果说 1979 年是宗教影响国际关系的标志性年份的话,那么,该年发生的运动和事件对当代国际关系具体产生了何种影响?

徐:首先,1979 年所发生的种种涉及宗教的事件和运动,标志着宗教对国际关系中心舞台的回归。在威斯特伐利亚国际关系体系形成后,主权至上取代了神权至上成为国际关系的准则。然而,1979 年发生的宗教运动及具有全球性的宗教政治化趋势,部分颠覆了威斯特伐利亚国际关系体系形成以来宗教在国际关系中的传统定位,使长期以来“沉默的宗教”变成了“反叛的宗教”,而频繁发生的暴力恐怖活动更是把反宗教极端主义提上国际治理和各国国家安全的主要议程。

其次,20 世纪 60、70 年代,全球范围的宗教复兴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意识形态或者更准确地说世俗政治意识形态控制力的下降和宗教认同影响力的上升,这便使许多国家和政权开始从宗教传统中寻找合法性依据和社会整合的资源,也使不少地区的广大民众放弃传统忠诚而转向宗教信仰。与 1789 年的法国大革命和 1917 年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等世俗政治革命不同,1879 年伊朗伊斯兰革命虽然有其经济和政治动因,但就主导意识形态、革命组织和领袖人物而言,这场革命是一场宗教革命。无论是革命前伊朗王室及其宗教反对派各自祭出居鲁士波斯帝国和第四任哈里发阿里的旗号、波兰关于其民族身份认同是基于天主教传统信仰还是依附政治意识形态的两军对垒,还是美国政治和宗教左右两翼之间关于如何界定美国社会性质和未来发展方向的“文化战争”,1979 年的宗教事件和运动都预示着全球范围“认同冲突”甚至“认同战争”时代的到来。在当前多元复合的认同结构下,宗教认同由于其作为具有广泛性、草根性、跨国性的强认同,有可能与国家认同产生对冲,从而成为各种国内和国际冲突的根源。在某种意义上,1979 年的涉教运动和事件所改变的全球地缘政治版图时至今日还大致存在。

^① 关于 1979 年所发生的重大宗教性国际事件及其影响,可参见 Christian Caryl, *Strange Rebels: 1979 and the Birth of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3; 另参见该书中文译本,克里斯汀·卡里尔:《历史的反叛:一九七九年的奇异变革及其阴影》,林添贵译,台北:八旗文化出版社 2014 年版;徐以骅:《宗教在一九七九》,载徐以骅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第十三辑),北京:时事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3—15 页。

再次,1979年的涉教事件和运动催生了各种非传统国际关系行为体,打破了向来主导国际关系体系的国家行为体的一统天下。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Alvin Toffler)曾将霍梅尼领导的以伊朗为代表的国际宗教势力与跨国公司、贩毒集团(可卡因帝国)等新型国际组织并列,称之为“全球角斗士”。这些新型国际关系行为体“向全世界宣告,民族国家已不再是世界舞台上唯一的,甚至不再是最重要的角色了”。^①除罗马教廷和伊斯兰革命后的伊朗,其他宗教非政府组织或以信仰为基础的组织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日益增长,俨然成为当前国际社会的一大组织景观。与各种国际经济组织一样,这些跨国宗教行为体也具有多元性,不仅包括国家间和政府组织,也包括各种非政府组织、传教组织甚至恐怖主义组织。它们在国家、地区和国际舞台上纵横捭阖,或具有助推“颜色革命”的能量,扮演着西方国家外交政策非正式执行者的角色;或在环保、发展、救援、健康等民生领域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或因其道德权威、中立地位、国际联系、丰富经验和动员能力而构成世界维和力量,在各国对外关系中被作为“遗失的治国术”重新启用。宗教和宗教团体作为公共外交载体的作用,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已经初露端倪,目前,宗教公共外交早已成为各国外交工具箱中的必备工具之一。

最后,1979年以来的国际关系史再次告诉我们,在当前的国际关系背景下,各国尤其是地区性和全球性大国,需要具有驾驭世界性宗教事务和妥善处理涉及宗教的国际性治理问题的能力。用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的话来说:“宗教是一种强大的力量,但其作用则完全取决于它激励人们所做的事。对决策者的挑战就是如何来利用宗教信仰团结的潜力,同时又限制其分裂的能量。”^②在处理国际性宗教问题上,尤其在应付宗教极端主义势力的兴起问题上,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均进退无据、举措失当,结果深陷战争泥潭,始乱终弃,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当今中东地区的乱局及自食宗教极端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坐大的苦果。

^① 阿尔温·托夫勒:《权力变移》,周敦仁、徐以骅、陈寅章、沈培娣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14页。

^② Madeleine Albright with Bill Woodward, *The Mighty & Almighty, Reflection on America, God, and World Affairs*,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2007, p. 66.

二、宗教与当代国际关系研究

涂:毫无疑问,全球宗教复兴对国际关系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您如何理解国际关系研究的“宗教转折”?

徐:全球宗教复兴及伊朗革命、东欧剧变尤其是震惊世界的“9·11”事件,给予忽视宗教的国际关系理论当头棒喝。1979年后,国际社会已经无法漠视宗教和宗教冲突给国际秩序带来的冲击,或坐视宗教极端势力的肆虐蔓延,而国际关系学界也开始对宗教“刮目相看”,摘下理性主义和启蒙主义的有色眼镜重新聚焦宗教。西方学术界如新自由制度主义罗伯特·基欧汉及乔纳森·福克斯等便称“9·11”事件对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来说就像是开闸放水,从此宗教与国际关系便结下了学术上的不解之缘。^①

在西方,宗教与国际关系的研究虽非始于当下,但长期以来,宗教一直在社会、文化和认同等框架下,或作为现代国际关系的起源及对国际关系研究奠基性人物如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等的思想启迪被加以讨论和研究,无论在作为上级学科的政治学专业还是在国际关系研究本专业领域均处于相当边缘的地位。2006年,两位研究美国政治和宗教的学者在对《美国政治学评论》(*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研究后指出,除经济学和地理学外,人们还很难找到比政治学更不关注宗教的一门社会科学。^②亨利·基辛格在其1994年出版的《外交学》一书中,^③竟没有“宗教”一词的索引,被指为国际关系研究中“宗教无用论”的经典例证。

率先打破这一忽视宗教现象的,是哈佛学者塞缪尔·亨廷顿1993年《文明的冲突?》一文的发表。^④该文虽未直面宗教,但把宗教作为理解国际关系要素的文明之基础,被视为国际关系研究非实证主义的“文化转向”的开端。1998年5月27日,伦敦经济学院的两位博士研究生F.佩蒂多(Fabio Petito)

^① 徐以骅:《全球化时代的宗教与国际关系》,第13页。

^② Kenneth D. Wald and Clyde Wilcox, “Getting Religion: Has Political Science Rediscovered the Faith Factor?”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100, No.4, 2006, p. 523.

^③ Henry Kissinger, *Diplomac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4.

^④ Samuel Huntington,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Summer 1993.

和 P. 哈兹波罗 (Pavlos Hatzopoulos) 在该院举办题为“宗教与国际关系”的研讨会。五年后的 2003 年两人还将有关论文结集为《国际关系中的宗教：从流放中归来》一书，^①作为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推出的“国际关系中的文化与宗教系列丛书”之一出版。该书从国际政治神学、多元文化主义、宗教信仰对国际冲突的影响等视角来讨论国际宗教问题，再度把宗教问题提上国际关系的研究议程，可说是开启了国际关系研究“宗教转折”的先河。

在缓慢地起步后，目前，西方学界对宗教与国际关系的研究已走上快车道，专门致力于该领域研究的有关论文、著作、期刊专号、系列论丛、学术会议、研究机构可说是层出不穷。前几年的有关数据就表明，“9·11”事件发生后，出版的有关伊斯兰教和战争的著作就超过以往任何时期的总和。2011 年的统计表明，有关宗教与国际事务的著作从 20 世纪 70 年代至 90 年代的平均一年一本上升至 2002 年以来的平均一年六本，在主要国际关系期刊上发表的有关宗教的论文也从“9·11”事件之前的每年 15 篇增至之后的每年 60 篇。^② 学术界的一些著名学者如贝格尔、哈贝马斯 (Jürgen Habermas)、威廉·康诺利 (William Connolly)、查尔斯·泰勒 (Charles Taylor)、何塞·卡萨诺瓦 (José Casanova) 等也纷纷介入，助推或者引导国际关系研究的“宗教转折”及相关论辩。

涂：目前，国外学者关于国际关系研究的“宗教转折”有哪些主要成果，还存在哪些问题？

徐：关于宗教与国际关系的关联性，西方学者尤其是国际关系学者的分析虽不尽相同但大致接近。一般认为，宗教主要通过宗教世界观、合法性来源、机构和领袖、群体认同、外交软实力、跨国宗教运动等路径作用于各国对外政策和国际关系。宗教问题国际化的表现形式各异，交互重叠，宗教往往也并非单独发挥作用。目前，宗教在国际关系学界已登堂入室，通常被作为与恐怖主义和文明等世俗现象相关联的次类范畴或因变量来加以处理的议题，开始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范畴。

^① Pavlos Hatzopoulos and Fabio Petito, eds., *Relig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Return from Exil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另参见〔意〕F. 佩蒂多、〔英〕P. 哈兹波罗编：《国际关系中的宗教》，张新樟等译，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② 徐以骅：《全球化时代的宗教与国际关系》，第 13 页。

宗教学和国际关系学都是各种学科均可染指的门槛较低的学科,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因此具有鲜明的跨学科研究特色。对于当前国外学界对宗教与国际关系全方位、多形态的研究,以及所产生的问题,可从以下几方面来加以归纳:

首先,正如有学者指出,国际关系研究的“宗教转折”是多重的,^①涉及各个不同的学科、理论、流派、路径,并且不分地域和宗教。此种“宗教转折”还是双向或多向的,其不仅促进了国际关系对宗教的研究,同时也推动了宗教学和其他相关学科对国际关系的介入。然而,目前的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主要还是偏重于亚伯拉罕宗教,而且以西方国家学者的研究居多。因此,虽然国际关系的“宗教转折”因其与全球性冲突和暴力事件有关,而引起比此前国际关系研究的其他学术转折更大的关注,但此一转折远非充分,对其他全球性宗教如佛教、道教、印度教、锡克教、摩尔门教、巴哈伊教等的“国际关系回归”尚留有大量研究空白,更不用说遍及世界各地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民间宗教和信仰了。

其次,如何将宗教融入国际关系理论的框架是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的一大难题。国际关系理论的三大主流范式即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及“英国学派”,尽管多少都能与宗教扯上点关系,但并不能为此种融入提供明确无误的指引,故诸多学者为促成此种融入而煞费苦心,甚至主张重起炉灶。哥伦比亚大学的国际关系学者杰克·辛德(Jack Snyder)在其所编撰的《宗教与国际关系理论》一书的“导言”中,归纳了国际关系理论界对宗教的四种研究进路或态度:(1)在传统范式内讨论宗教对国际体系等的作用,可称为守旧派;(2)宗教应取代现有范式而成为透视国际关系的主要棱镜,可称为改造派;(3)主张因宗教而调整看待世界的基本观点,同时吸纳传统范式的见解,可称为折中派或修正派;(4)回避范式问题而研究宗教为其中自变或因变量的较有针对性的假设,可称为实用派。^②改造派与其余三派的分歧,在于是借宗教因

^① Vendulka Kubalkova, “The ‘Turn to Relig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Dec. 3, 2013, <http://www.e-ir.info/2013/11/03/the-turn-to-religion-in-international-relations-theory/>, 2017-08-08.

^② Jack Snyder, “Introduction,” in Jack Snyder, ed., *Religion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2-3; 另参见 Eva Bellin, “Faith in Politics, New Trends in the Study of Religion and Politics,” *World Politics*, Vol.60, No.2, 2008, pp. 313-347.

素而“重建学科”(即把宗教作为重新界定和改造国际关系学科的非实证主义导向,如建立国际政治神学等改造方案),还是国际关系应“正视”和“收编”宗教(即把宗教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并使其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主流化”)。不过目前无论是“打补丁”“收编”“改造”还是“重建”,都还是说得多做得少,浅尝辄止,往往沦为空头支票,而国际关系学界我行我素,不承认宗教挑战或贬低宗教作用的仍大有人在。有学者就尖锐地质疑把宗教这种极为不同的观念融入国际关系理论的可行性,称如果一个理论什么都想管,结果将是什么也管不了。^①因此,在有关学者宣布宗教已回归国际关系的10多年后,国际关系研究的“宗教转折”仍步履蹒跚,宗教作为当代国际关系中的自变量,以及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作为主流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分支的地位远未确立。

再次,我曾指出,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可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可单指基于国际关系或政治学学科对国际宗教问题的研究;而广义的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则泛指国际关系学科与其他学科如神/哲学、宗教学、社会学、历史学、语言学等学科共享的甚至由其他学科居主导地位的研究,或可称为宗教与国际问题研究。就议题而言,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还可有“主议题”与“共议题”之分。“主议题”即狭义的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包括宗教与当代国际制度、国际体系、国家/国际安全、各国外交、地缘政治等议题;“共议题”即广义的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如宗教与全球治理、国际组织、全球化、互联网、后世俗化、国际法、国际冲突和对话等议题。做此类区分有武断成分,却有助于了解宗教与国际问题研究的现状和前景。^②总的来说,在西方目前上述狭义和广义两类研究可说是旗鼓相当,或者说后者还略胜一筹,事实上,许多有关论著是此两类研究的共同结晶。目前,西方两大出版社推出的宗教类系列学术论丛,即上述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的“国际关系中的文化与宗教系列丛书”,以及剑桥大学出版社的“剑桥社会理论、宗教与政治研究系列丛书”,也是上述两类研究的综合。

狭义的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有助于推动国际关系理论的“范式转移”,但因理论储备不足且缺乏深入细致的个案研究而流于空泛,被称为宽泛路线

^① Aminul Hassan, "Book Reviews," *Political Studies Review*, Vol.14, Issue 2, May 2016, p. 260.

^② 徐以骅:《全球化时代的宗教与国际关系》,第16页。

(broad route); 广义的宗教与国际问题研究尽管对某一宗教运动或某一区域性宗教有详尽考察或个案研究, 但未能举一反三, 提出具有普适性和规律性的理论, 被称为深窄路线 (deep route)。鉴于上述情形, 有政治学学者如罗恩·E. 哈斯纳 (Ron E. Hassner) 便倡导折中路线即所谓厚实路线 (thick route), 意指在充分注重宗教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归纳提炼出解释国际关系现象的较广泛理论,^① 而伊娃·贝林 (Eva Bellin) 等则主张注重问题驱动的研究和 中层理论的积累, 来实现国际关系研究的“宗教转折”。^②

最后, 某一学科或研究领域的成熟度往往是由标志性研究成果来代表的。就此而言, 目前宗教与国际关系领域虽成果甚众, 但一致公认的精品佳作却凤毛麟角, 如果不是完全付之阙如的话。在狭义的宗教与国际关系领域, 除上述《国际关系中的宗教: 从流放中归来》《宗教全球复兴与国际关系的转型: 争夺 21 世纪灵魂》《宗教与国际关系理论》《宗教、认同与全球治理: 理念、案例和实践》等论著外, 近十多年来陆续出版的值得关注的著作类成果主要有《宗教与国际关系》《把宗教带入国际关系》《宗教与国际关系导论》《当前国际体系中的宗教与政治》《上帝的世纪: 宗教复兴与全球政治》《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宗教: 互动与可能性》《现代世界中的宗教与政治变迁》等。^③ 这些论著对国际关系“宗教回归”及国际关系研究“宗教转折”的意义、路径、模式、方法、趋势和议题等作了开拓性和基础性的探讨, 但也招致诸如编著多专著少、缺乏系统理论、实证性个案较弱及对策目的过于明显等批评。如上述《宗教与国际关系理论》一书尽管扛起了宗教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大旗, 但其大部分内容却被专门从

① Ron E. Hassner, “Religion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The State of the Art,” in Patrick James, ed., *Religion, Identity, and Global Governance: Idea, Evidence, and Practice*,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11, pp. 43-51.

② Eva Bellin, “Faith in Politics, New Trends in the Study of Religion and Politics,” pp. 317-318.

③ K. R. Dark, ed., *Religion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asingstoke, Hampshire: Palgrave, 2000; Jonathan Fox & Shmuel Sandler, *Brining Religion in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Jeffrey Haynes, *A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Religion*, England: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2007; Eric O. Hanson,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Toda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Monica Duffy Toft, Daniel Philpott, and Timothy Shah, *God's Century: Resurgent Religion and Global Politics*, New York: W. W. Norton & Co., 2011; Nukhet Sandal & Jonathan Fox, *Relig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actions and Possibilities*, Abingdon: Routledge, 2013; Jeffrey Haynes, ed., *Religion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the Modern World*, Abingdon: Routledge, 2014.

事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的同行学者所批评,认为为其既不涉及国际关系又与国际关系理论无关,^①颇令诸编著者尴尬。因此,西方有论者指出,目前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主要问题“并不在宗教议题被忽视,而在于宗教议题缺乏理论”。^②

三、中国的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

涂:我国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是如何开展起来的?

徐:在我国,从1949年后到“文革”结束前近30年的时间内,宗教学术研究基本陷于瘫痪局面。在只有宗教批判而无宗教研究的时代背景下,意识形态化的宗教策论便占据宗教出版领域的主导地位。自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以来,国内的宗教研究逐步复苏并呈现较强劲的发展势头和极清晰的学术转向。不过,与其他学科如哲学、历史学、宗教学、社会学等领域相比,国内的国际关系学界对宗教议题的研究相对滞后,一些对国际宗教问题较全面的介绍,如《世界宗教问题大聚焦》《当代世界民族宗教》《当代世界宗教问题》^③等论著是到21世纪初才陆续问世的,并且主要还不是出自国际关系学者之手。

在上述全球宗教复兴、国际关系的“宗教回归”、西方国际关系学界的宗教转向尤其是非传统安全研究趋热的影响下,国内的国际关系学界已开始关注宗教与国际关系/政治问题,各种有关非传统安全的研究机构和研究项目应运而生,宗教和文化作为非传统安全问题被列入研究议程。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海外利益的全球化,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文化和宗教在中国国家外交和安全战略中的作用和影响进一步进入学界视野,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获得新的推动力。这表现在有关论著的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及有关部委和省

^① Jeffrey Haynes, “Book Reviews,” *Politics, Religion & Ideology*, Vol.13, Sept. 2012, pp. 400-402.

^② Eva Bellin, “Faith in Politics, New Trends in the Study of Religion and Politics,” p. 340.

^③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民族与宗教问题研究中心编:《世界宗教问题大聚焦》,北京:时事出版社2002年版;李德洙、叶小文主编:《当代世界民族宗教》,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版;国家宗教事务局宗教研究中心编:《当代世界宗教问题》,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版。

市社科项目的立项、有关研究机构和宗教类智库的建立、有关学术会议的召开,以及全国高校和社科院系统宗教与国际关系课程的开设等。在上述研究机构、项目、会议、成果、课程的推动下,国内对宗教与国际关系议题的关注进入学术化的新阶段。

涂:我国的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所关注的议题有哪些,取得了哪些成果?

徐:就广义的宗教与国际问题研究而言,国内相关研究的重点领域或议题分别为宗教与全球化、世界民族与宗教、国际宗教热点问题、宗教与国际和地区冲突、各国各地区宗教现状、国际宗教运动、比较宗教研究、国际宗教对话、宗教与国际法、新兴宗教、国际伊斯兰研究、文化与国际关系、宗教与外交、宗教与“一带一路”、宗教对外交流和公共外交、宗教与国家安全、反宗教极端主义及反恐怖主义等。除专业学术期刊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主办的《世界宗教研究》和《世界宗教文化》等外,相关系列论丛和期刊多数归在诸如地区研究和战略研究的名下,如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主办的《当代中东研究系列丛书》、上海高校智库复旦大学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中心主办的《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战略论丛》,以及该中心与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合办的学术集刊《宗教与美国社会》等。上述领域的研究不胜枚举,^①其中著作类的包括《“全球化”的宗教与当代中国》《美国与伊斯兰世界》《国际政治关系中的宗教问题研究》,以及《全球化背景下的宗教与政治》等。^②

相对而言,狭义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的成果要少得多。2004年5月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成立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并于2010年推出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宗教与当代国际关系研究论丛》,目前已出版十辑,包括《宗教与当代国际关系》《美国基督教福音派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以葛培理为中心的考察》《国际社会中的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宗教功能单位与地区暴力冲突:以科索沃冲突中的德卡尼修道院和希南帕夏清真寺为个案》

① 有关成果参见徐以骅:《导论:当代国际关系的“宗教回归”》,第20—26页。

② 卓新平:《“全球化”的宗教与当代中国》,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高祖贵:《美国与伊斯兰世界》,时事出版社2004年版;张战、李海君:《国际政治关系中的宗教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年版;刘义:《全球化背景下的宗教与政治》,上海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后冷战时期的宗教与美国政治和外交》《爱德华·萨伊德与中东政治》等,^①目前尚有多辑待出版。与其他相关论著相比,章远所著《宗教功能单位与地区暴力冲突》及刘骞所著《后冷战时代的宗教文明与国家安全》等较具国际关系研究气象,^②这与著者的国际关系学科背景有关,其他相关论著仍可归入宗教与国际问题研究或介于狭义和广义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之间。国内国际关系研究权威期刊《世界经济与政治》在2011年第9期特设“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专栏,刊发了《全球化时代的宗教与国际关系》《科索沃冲突中的宗教因素解读》《当代基督宗教传教运动与认同政治》《互联网、宗教与国际关系:基于结构化理论的资源动员论观点》《后冷战时期宗教与国家安全的关联性讨论》等五篇文章,^③可说是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进入国内主流国际关系研究的“入门仪式”。宗教与中国对外文化战略、安全战略和公共外交是目前我国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的重点议题,^④本人及其研究团队还先后提出了“信仰中国”“信仰周边”“地缘宗教”“大国宗教”“后传教时代”“宗教与中国公共外交”等理念和分析框架对之加以阐述。^⑤但目前无论就成果还是就影响而言,国内的国际关系研究只能说有某种“宗教关注”,还谈不上“宗教转折”。

徐:我国的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有哪些问题,有哪些努力方向?

徐:目前国内学术化的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似具有以下特点及问题:

第一,“重文化轻宗教”及“还圣为俗”。即把宗教现象作为文化的一部分

① 徐以骅等:《宗教与当代国际关系》,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2015年再版;涂怡超:《美国基督教福音派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以葛培理为中心的考察》,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李峰:《国际社会中的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章远:《宗教功能单位与地区暴力冲突:以科索沃冲突中的德卡尼修道院和希南帕夏清真寺为个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徐以骅:《后冷战时期的宗教与美国政治和外交》,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李意:《爱德华·萨伊德与中东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② 刘骞:《后冷战时代的宗教文明与国家安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

③ 参见徐以骅:《全球化时代的宗教与国际关系》,《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9期;章远:《科索沃冲突中的宗教因素解读》,《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9期;涂怡超:《当代基督宗教传教运动与认同政治》,《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9期;黄平:《互联网、宗教与国际关系:基于结构化理论的资源动员论观点》,《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9期;刘骞:《后冷战时期宗教与国家安全的关联性讨论》,《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9期。

④ 有关研究可参见卓新平:《中国宗教与文化战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徐以骅、邹磊主编:《宗教与中国对外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蒋坚永、徐以骅主编:《中国宗教走出去战略论集》,宗教文化出版社2015年版。

⑤ 有关研究可参见徐以骅等:《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时事出版社2016年版;徐以骅:《从“信仰中国”到“信仰周边”: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宗教互动》,载徐以骅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第十五辑),时事出版社2017年版,第1—7页。

来加以讨论,这固然反映了国内宗教研究的滞后,也折射出国内学界在一般宗教研究问题上仍未摆脱把宗教解释为某种社会存在(如政治、经济、种族等)的附带现象的传统研究套路、较为边缘化的学科处境,发表难、出版难、经费少是宗教研究领域的较普遍现象。

第二,“受宗教对国家安全威胁的驱动”。目前,对一些特定议题的专门研究相对发达,对各种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尤其是对由宗教驱动的恐怖活动、宗教冲突和民族宗教问题这些议题,成为反境外宗教渗透和反宗教极端主义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这自然与我国国家安全的现实处境有关。不过,在西方学界也有相同的“主要通过安全的棱镜来看待宗教”的情况。^① 宗教不能与恐怖主义画等号,但宗教和宗教组织往往为暴力、干涉和分裂活动提供合法性依据和活动载体。宗教作为合法性途径具有多重性,它既可用于为国际调停及民族和解服务,但宗教教义也被认为是种族清洗和恐怖主义的“最通常的合法性依据之一”。^② 目前,西方的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虽然也提出“以信仰为基础的外交”等强调宗教维和、促和及调解冲突功能的理论和操作模式,但对宗教在国际舞台上的负面作用的研究还是要超过对其正面作用的研究,这被认为是国际关系研究“宗教转折”的主要偏差之一,而此种情况在我国的相关研究中不仅存在,而且更为明显。“多元融通、和合共生”是中国宗教思想和实践的优质资产。因此,研究如何发挥宗教尤其是我国宗教及宗教团体在促进国际和平方面的正面功能以及可操作性,应成为我国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的主要任务之一。

第三,理论和实证研究的瓶颈。我国宗教与国际关系的研究目前还存在一系列问题,如缺乏地区乃至全球范围的大规模实地调查和资料收集工作、未充分具备建设数据库和处理数据的能力、专业课程开设不足和专业研究机构缺失、国际关系学界对宗教议题的普遍忽视,以及缺乏国际宗教对话的实际经验和相关人才等,这是制约我国开展相关研究的软硬件瓶颈。而对跨国宗教和宗教现象(如宗教与地区和暴力冲突)的数据处理、量化分析和实证考察,恰

① “Editor’s Forward,”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Fall/Winter 2007, pp. v-vi.

② Jonathan Fox and Shmual Sandler, *Bringing Religion in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38; 另参见徐以骅、章远:《试论宗教影响中国国家安全的路径和范式》,《复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第113—114页。

恰是目前西方有关研究的特点和强项。此外,国内学界对国外相关研究的现状和动态不够掌握,缺乏对国外有关成果作较全面介绍、翻译尤其批评的机制,也阻碍了该领域的学术进展,而这种机制在目前国内国际关系研究的其他领域已相当成熟。

第四,对策研究与学术研究的平衡问题。目前,国内对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的重点议题包括宗教与中国公共外交、宗教与中国外交和安全战略、宗教与“一带一路”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宗教风险等,宗教问题日益被视为增进我国对外战略的完整性以及提升我国国际形象的重要因素。这种现实的智库性研究取向固然有助于提升我国宗教研究的地位,扩大宗教研究的空间,并且有可能较快取得成果,但宗教研究的“安全化”和“战略化”取向,也有使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降至“短、平、快”时事报道和分析水准的隐忧。因此,我国的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要处理好对策和学术研究之间的关系,在提升对当前国际宗教动态分析能力的同时,形成对全球宗教发展长期趋势的研究能力,以及对国际关系研究“宗教转折”的原创性和统摄性理论,超越涉华议题、安全议题和描述性个案研究的局限,使宗教研究对国际关系研究产生学科性的贡献。^①

总之,除涉华课题外,目前就整体而言,国内的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还处于介绍、积累和起步的阶段。不过,近年来国内的宗教学研究和国际关系研究已经出现相互结合和相互转向的端倪。假以时日,我国的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将会有更充分的发展。

^① 徐以骅:《导论:当代国际关系的“宗教回归”》,第22—24页。